

新文科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解读

阴健 赵嘉明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江苏 扬州)

摘要: 文章以贝弗里奇的经典著作《科学研究的艺术》为基础, 立足“新文科”研究方法论的转型需求, 提出“科学性、批判性、逻各斯”三大核心维度, 系统梳理了科学研究中的知识建构机制、批判性思维路径与理性精神追求。研究强调, 《科学研究的艺术》不仅是研究方法的手册, 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修炼与人生哲学的思考; 并且提出新文科研究者在跨学科、数智化背景下, 应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重建意义结构, 实现方法论与精神质素的融合。为新文科方法论的深化提供批判性与创造性的学理参照。

关键词: 新文科; 方法论; 贝弗里奇; 主题分析

一、引言

《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以典型的科学研究案例与科学家的观点为素材, 批判性分析了科研过程中的行为实践、思维技巧与心智活动作用于科学发现的共性规律, 讨论了从事科研工作的思维脉络, 开展学术研究的社会语境, 并基于得出的结论给出成为一名优秀科学家的种种建议。其中的很多观点, 已演变成当今学术研究的一般范式。本书的作者贝弗里奇在序言中坦言章节次序为任意安排, 但是通过归纳仍可以总结出书籍的内容结构。粗略地, 这本书所讨论的诸范畴可分为实践与精神两个层面。前一层面包括“准备工作、实验、观察”; 后一层面涉及“假说、想象力、直觉、推理”, 其中“假说、推理”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活动, “直觉、想象力”属于感性的精神活动。进一步地, 新文科不仅强调方法的技术层面更新, 更关注研究背后的认知结构与知识生成机制。从“实践—精神”两层结构来看, 这种区分恰好为新文科方法论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在实践层面, 新文科倡导跨学科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手段, 如LLM文本挖掘、可视化、网络民族志等, 其本质是对“准备工作、实验、观察”的数字化增强; 而在精神层面, 新文科方法论强调理论建构与意义阐释的同步推进, 将假说构建与符号解释、逻辑推理与文化批判、想象力与情境理解并置使用, 从而在技术理性与人文感性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由此可见, 贝弗里奇所描绘的科学研究范式虽源于自然科学, 却在更高层次上与新文科倡导的“融合、创新、批判”研究精神形成共鸣, 为我们理解新文科方法论的深层逻辑提供了可能的参照。更细致地划分, 这本书的论域可分为“实践过程、心智过程、主体发展过程”相互影响的三个方面。本研究的解读对这三方面进行文献分析, 整理分析后从“科学性、批判性与逻各斯”三方面进行论述。

《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提出: 科学研究就是对新知识的探索, 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 但具有共性。该书从经验事实出发, 归纳出科学研究的一般性原则, 并指出科学家应具备素养与生活图式, 这是本书的优点。不过作者囿于时代的、学科的限制性, 论说中也存在一些“不尽科学”的地方。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他对诸多认识方面问题的解释, 往往是常识经验性的, 但是在人文社科中有着更系统精确的模型; 二是作者援引的论据支撑材料有很多出处存疑, 最明显的是语句表达中使用了“据说”一词, 令很多推理断言失去了前提的有效性、真实性。

《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标题中“艺术”二字尤为显眼。在书中, 每一章节的开篇均引用了一篇文学艺术作品的原文, 来表达该章节的核心思想。但更重要的是, 作者将工具理性的“科学”概念与价值感性的“艺术”概念建立起联系。基于作者书中的立场主张, 本研究认为这是作者试图强调, 要在严肃的自然科学中寻找诗意的栖居。这意味着, 该书不同于研究方法的工具书——不是在传递一套可以标准化、机械复制的研究操作流程, 而是关照科研工作者的自身的精神本然。因而将《科学研究的艺术》置于新文科方法论的语境下, 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超越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 也提示我们应在方法论建构中引入对“解释”的自觉意识。

皮尔斯符号学的“解释项”指出读者对原文本意义阐发的重要性。^[1]这一理论视角对新文科尤为重要。新文科并不追求单一的研究范式, 而更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深度互动与互构关系。在此意义上,

作者简介: 阴健 (1997-), 男,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22 级硕士研究生; 赵嘉明 (2002-), 男,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24 级硕士研究生。

贝弗里奇以文学文本作为科学论述的引子，正体现了一种试图打破学科疆界、复调建构知识的尝试。我们不仅要强调科学精神中想象力，还要强调“人文关怀”“意义追问”“文化反思”。新文科的方法论不应仅仅追随技术的进步，更应回归到对知识的感性认知与解释维度的重视，强调科研过程主观现身与精神自觉。

二、解读的方法

《科学研究的艺术》共有两册，其中一册为续篇。续篇与前篇的讨论范围相近，主要是借用新的理论概念，进行更加成熟的体系化论述，加强了几个概念之间的过程性联系，对各部分的子概念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在阅读时，笔者首先阅读了序言以了解书籍的结构与写作目的。前已述，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方法研读。主题分析 (Thematic Analysis) 属于定性研究方法，用于识别、分析、组织和呈现文献中的“主题” (themes)。[2]所谓“主题”，是指文献文本中关于某一研究问题反复出现的意义模式。本研究采用“归纳”逻辑对书籍进行结构性解读。不预设理论框架，对文本材料进行初级编码。然后，将初级编码聚类为具有共同意义的主题，通过反复验证主题的覆盖性与代表性，得出“科学性、批判性、逻各斯”三个主题。科学性构建知识秩序的定理与保障，批判性则是科学工作者反思与更新的研究态度、立场和思维，逻各斯是科学工作者研究的动力与对科学发现的追求。三者构成本书内容的共生结构。

三、新文科研究的科学性

贝弗里奇在书中提出“系统论”，从整体视角论述研究的科学性。其提出，各要素大多数事物以有组织的复合体整合地存在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论提供了一个把许多现代方法与研究负载组织联系起来的中心主题。^[3]系统论通过提供结构化、整体性与动态关联的思维方式，保障了学术研究在逻辑合理性、理论创新性与方法适用性上的科学认识，避免片面性、封闭性与非系统性带来研究谬误。传播学就是对信息系统展开研究的学科。符号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同样都是一个个的系统，有其理论疆界，在人文社科中往往需要视域融合，在不同系统间建立联系共同解释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其中，要定义清楚系统的基本单位，如传播学中的“信息”，符号学中的“符号”，社会学中的“家庭”，政治学中的“权力”等。在这之上系统中的各要素通过关系连接，构建出系统的结构特征，包括嵌套结构，层级系统结构。因此，在系统论视野下，科学地理解一个现象不仅要分析其组成要素，还必须考察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正是这些结构性互动机制赋予系统整体以功能、目的与有机性。更重要的是，系统中的“要素”在新文科视野下并不总是先验给定的对象，而常常是文化构型与历史经验的产物。这要求研究者在建构系统时，不仅要考察要素之间的因果或功能关系，更应审视这些要素的历史演化、意义延异与符号缝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论不仅是一种分析工具，更是一种批判意识的生成机制——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看似稳定的系统背后，都有可能隐藏着被自然化的意识形态预设。因此，在新文科方法论中引入系统论，是一种旨在穿透表象、复调理解、重建意义结构的思路。

除系统论的整体视角外，科学性具体而言分为“保障”与“生成”两方面。保障是指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保障通过书中提到的“实验”和“推理”实现；生成是指生成科学性的研究，在于思维的“创新性”。

首先，作者就“探索性”和“实证性”两类实验类型进行区分，并提出：第一，实验是验证假设的工具，对待实验应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第二，可以用统计学解释实验结果，实验的结果有其适用范围，结果在一定语境下才为真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三，设计实验要注意经济性和可操作性，要把握好实验工作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看到实验有其局限性。第四，作者提出要对实验与观察始终坚持一个客观的态度。作者强调了“逐步排除法”在实验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现代统计学的发展下，侧重线性地剥离变量以寻找因果关系的思维，已被非线性的模型与数据之间循环调整，以逼近复杂系统最优解释的非线性思维所取代。在人文社科或者说新闻与传播学中，虽有“思想实验”这样的研究方法，但“文科”更加侧重“观察”而非实验。因为人文社科面对的是社会现象，控制变量并非行之有效或科学的。理工科实验更加强调对结果“复现”，而人文社科更加注重对现象的“解释”。人文社科中的质性研究方法有“田野、民族志、扎根理论、访谈”等，其他在于通过在一定社会语境中的人的经验与意义建构，揭示社会现实的深层关系结构与文化生产逻辑。除定性方法外，如今新闻传播学科的定量方法也比较盛行，并且越来越多的期刊偏向于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论文。然而定量研究由于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其在人文社科应用中的合理性还有待探索。这些根本问题产生于数理关系的局限性，它忽略了社会现象深层的逻辑关系，简化了现实结构；数据处理结果的显著性，对于人的认知来说可能是无意义的；最重要的是统

计学的方法不能反映人的主观认知，因为认知并非可以通过数量关系去分割。

因此，新文科方法论的关键挑战，不仅在于识别何种方法适用于何种问题，更在于如何构建一种能够回应复杂社会结构与多层认知逻辑的解释框架。在此语境下，“混合研究方法”日益受到新文科研究者的关注。混合方法并非简单地将定量与定性拼接，而是在明确二者各自认知优势与局限的基础上，追求方法论上的互补与层次递进。例如，在新闻传播领域，对社交媒体信息传播路径的量化建模，能够揭示宏观层面的扩散机制，而对传播语境中受众的意义解读与话语实践的质性分析，则补足了数字轨迹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力。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统计数据还是观察数据，而在于研究设计能否有效嵌入具体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将现实问题与既往的理论进行对话。与理工科不同，文科所研究的对象往往是“有意义的人”，研究者本身也并非局外人，而是带着特定知识背景、意识形态与情感立场的参与者。新文科研究不能仅以“有效性”“显著性”“可验证性”等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自限，而应引入对“解释的深度”“跨学科视野”“研究者的自我定位”等维度的反思。

其次，作者认为“科学仅仅描述如何，而不描述为何”，所以推理在研究中的作用，在于将经验事实（来自观察和机遇）整合到知识体系中，而非得出因果关系。其在书中还论述了“内插法与外推法”两类推理方法。然而，在作者看来，逻辑推演与新发现具有矛盾关系，逻辑推理会阻碍创新。^[4]具体而言，其基于逻辑学在科学研究中是指导性的前提，指出逻辑学的一个弊端——概括，认为经逻辑推演的结论永远不能得到证实，不会具有绝对普遍性。逻辑学的另一个弊端是，逻辑只处理言词符号，而不处理实在。^[5]本研究认为作者的判断有其合理性，但在人文社科中，逻辑却是对“科学性”的保障。换言之，逻辑是确保人文社科研究过程内部的一致性、概念界定清晰性、论证具有可辩性、合理性的工具，这包括非形式逻辑与符号逻辑。新文科所追求的并非形式主义下的逻辑至上主义，而是一种包容解释弹性与语义复杂性的逻辑素养。这意味着，逻辑工具必须与语言、历史、情境和意识形态分析协同运作。例如，在传播研究中分析国家叙事的建构时，研究者既需要在语义链条中追踪叙述策略的合理性，也需辨析其中是否存在推理谬误、概念转移或预设前提，从而在揭示话语权力的同时保障研究的批判深度与解释效度。因此，逻辑在新文科中并不只是分析工具，更是一种方法论伦理——它要求研究者在面对模糊性、多义性与解释张力时，仍不放弃对结构清晰、推理一致与意义可追问的基本追求。

最后，作者提出“想象力”的概念来支撑科学研究中的“创新性”要素，在续篇中则通过“创造性思维”进行更加系统的论述。贝氏建议，一是要真正做到多思。^[6]因为其认为对问题的解决途径，取决于过去对该问题的经验和训练对头脑的武装程度。^[7]二是要具有“好奇心”，好奇心背后有着理性的研究目的。作者认为应该强烈地去寻求其间并无明显联系的大量资料背后的原理。^[8]三是提出“跨学科”思维，他在书中并无明确提出“跨学科”的概念，但其指出优秀的科学家常常专修学科之外的人，同时制定研究方向，研究计划也需要触类旁通、博采众言。^[9]在续篇中，作者通过形态学的方法尝试对“创造性思维”进行更有力的解释。然而新闻与传播学中的“诠释包裹”理论、语言符号学的“概念整合”理论早已对人的创造性心智系统进行了更具解释力的论说。“概念整合”理论认为，人类通过在多个认知空间间构建映射并融合信息，生成超越原始概念的新意义，从而实现创造性思维与语言理解。它揭示了人类创造性认知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不同认知空间之间复杂的类比、映射与融合机制之上。在新闻与传播学语境中，这种跨空间的认知投射尤其重要。新闻文本、公共叙事、媒介语言往往要求受众在多个知识图式之间来回穿梭，将政治、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信息整合为具有传播力与说服力的论说文本——将哲学理论转译为传播分析工具，将语言现象解释为意识形态的表达，将技术演进纳入文化再生产的链条中。这些都不是逻辑推演所能穷尽的操作，而是一种认知跨越与意义重组的创造行为。

四、新文科思维的批判性

一方面，思维的批判性体现在作者对“阅读、机遇、假说、观察”中的论述，其核心观点是防止思维惯性的因循守旧，强调独立思考。另一方面，思维的批判性还体现在作者每一章节的论说中，在对每一种的研究思维或研究方法的评价，作者均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其利弊。甚至批评思维本身，作者也在续篇中通过与无控性思维的比较，论述了其优势与劣势。

首先，作者在开篇“阅读”部分就提出了批判性阅读，论述了批判性阅读的功能价值是提供创造性，同时亦提出批判性阅读的基础是读者要具有一定的学科背景性知识。那么在阅读部分，作者还提及阅读的文献选择和阅读的方法。其中尤其表达了对“一手文献”的肯定以及对“二手文献”的否定。本研究对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犯了原教旨主义的错误。比如在扎根理论中主张从经验和二手文献中归纳概念，强调多源资料的理论饱和。忽视二手文献的重要性，可能会违背理论生成的开放性原则。基于批判性阅读，

作者提出系统查阅文献，整理资料，设计简单的、结论明确的实验并进行证明的方法论建议。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批判性阅读对于“新文科”研究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批判性阅读不仅是获取信息的手段，更是生成问题意识、构建研究视角与推进学科理论创新的基础性实践。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渐融入学术研究流程的当下，一个新的方法论问题随之浮现：GenAI 是否能够替代人的批判性阅读？对此应持谨慎态度。尽管 GenAI 能够实现文献概括、语义识别与观点聚合等技术功能，在表面上提升了阅读的效率与覆盖面，但其仍局限于预训练模型与已有语料之间的统计学习关系，难以真正完成基于历史脉络、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反思的深层理解。换言之，批判性阅读不仅关乎文本处理能力，更关乎主体性的在场与学术判断力的实践。对于新文科而言，方法论的根基不在于获取多少信息，而在于如何识别信息中的知识“根基”，去掉繁杂的信息包装，找到核心的逻辑起点。因此，GenAI 可以成为批判性阅读的辅助工具，却无法取代其作为认知主体进行意义生产与学术判断的核心地位。

其次，作者对于“机遇”的论述包含了批判性思维。他提出，机遇是一种意外、偶然的联系，不具有预设。因此需要科研工作者对于最小线索的注意。^[10]他进一步指出，主观能动性、知识积累与认识深度有利于培养捕捉机遇的科研敏感性。这样的科研意识属于“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唯有深植于日常经验、通达未显之境，方能于微处感悟大道、于无意中得真知。对于新文科而言，这意味着研究方法不应仅依赖可操作性的技术路径，还必须容纳不确定性与灵感的生成机制。因此，将“机遇”纳入方法论视野，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一种修正，也是对跨学科创新机制的一种哲学阐释，强调了研究者在知识生成中的“不确定性”。

再次，作者在“假说以及发现”的讨论中举证了批判思维的重要性，指出假说的作用是提出新实验或新观测。^[11]进一步而言作者还提出，一是指出证明假说有直接、间接两类论据。二是其批判性地指出“随时修改假说”和“对假说持抱坚定信念”两类态度对于科研创新性兼具利弊。三是作者借用“移植法”的概念指出学术创新的路径。^[12]四是当假说被提出后，需要批判性地对其审查，反复论证可行性。五是他还对波普尔对假说的否定进行了批判，认为假说即使被证明错误仍然有价值。假说是指提出新的命题。当下，“数字人文”是新文科研究体系的重要支流，其包括用数字人文的方法研究社会命题，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知识图谱。不过，传统的人文社科方法则凭借细读、诠释历史脉络、与实地调查分析。在新文科框架下，这两种方法并非相互排斥，而是通过假说的提出与检验实现有效对接：数字工具提供手段支撑，而传统诠释赋予假说以人文关怀与思想深度。因此，新文科的方法论应追求“技术与诠释”的双重路径：既重视从大数据中发现问题并提出假说，也强调对假说进行理论上的内在论证与语义上的文化解读，从而构建出兼具经验支持与思想张力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作者还指出，提出假说时宜尽量避免个人的预设。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悬置”指的是对一切先入之见和自然态度的暂时搁置，以便纯粹地把握现象本身；在科研中，提出假说时尽量避免个人预设，正是运用“悬置”原则，通过排除主观成见，保持对研究对象开放而中立的态度，从而更接近事实的本真呈现。这正是新文科研究中应极力避免的一点，那就是“为了数据而数据”，统计学手段不再提供论据，而是干扰了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认识。除此之外，作者提出发现能力的培养。本研究想援引麦克卢汉的例子对此话题延伸。麦克卢汉选择留在加拿大，是为了保持对美国媒介帝国的文化“边缘”视角，从而获得更清醒的观察与批判距离加拿大的地理与文化位置恰构成了他解码媒介环境、洞察技术逻辑，对于新文科而言，这提示我们在构建研究方法时，需警惕过度内嵌于主流范式而丧失反思可能的风险。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发现，往往源于边缘视角、跨界经验与认知异质性的激荡。因此，新文科的方法论应倡导“边缘中的中心”思维，即通过对主流知识结构的距离感保持方法上的开放性与视角上的多元性，从而在复杂多变的文化与技术环境中拓展学术创新的可能空间。

最后是“观察”，直至此，科学研究的一个完成过程得以窥见，即“机遇、观察、发现、假说”的顺序。作者认为观察的目的，是捕捉各事物之间、事物与知识之间任何具有启发性的关系。^[13]作者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了“科研鉴赏力”的概念，这是一种对前述各类科研素质的综合，通过科研鉴赏力，能够预先对研究命题进行价值判断，对研究成果进行价值评价。在人文社科中，“观察”不仅是收集经验材料的工具，更是揭示权力、意义与结构隐蔽机制的路径。它促使研究者进入日常情境，感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者能够发现被忽视的微观行为与潜在规范，揭开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观察的批判性还体现在对知识生产过程的反思，研究者自身的位置与偏见也成为分析对象。因此，观察不仅是看见表象，更是揭示背后机制、挑战常识认知的批判实践。在新文科语境中，观察超越了传统人文社科中“资料收集”的工具性地位，转而成为揭示权力机制、意义结构与意识形态的批判路径。特别是在参与式观察与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不再是中立的旁观者，而是深度介入的行动者，其自身的知识位置与偏见同样构成分析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新文科研究中，观察往往与“记录”联系在一起。在各种数字工具的帮助下，新文科研究可以时时观察时时记录，这其实削弱了传统文科研究中对“记录”技术的重视。

五、新文科对“逻各斯”的坚守

本部分用了“逻各斯”的概念对主题进行归纳。“逻各斯”是希腊哲学中一个核心而多义的概念，其含义历经演化，但始终代表着历史长河中的思想巨匠对于“理性、规律、真理”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是进行科学工作的驱动力。这里借用逻各斯一词并非想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是对科学家所具有“科学素养”的隐喻。

贝弗里奇认为想象是研究的驱动力。^[14]这是无疑的，正是因为人类无边无际的想象，才使古圣先贤举起思想的火炬，照亮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路。作者提出，对研究人员来说最重要的品质，自觉无知和学术上的诚实。正是这样的品质，构成了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核心素养，推动着研究者勇于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书中提及一个案例，哈维斗争二十年，血液循环说才被普遍接受。^[15]这表明，科学研究有时要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包括外部的社会压力和内部的心理压力。这时候，对科学研究的热情之火，学术道德素养与社会责任，会支撑优秀的科学家坚定信念，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哈维的血液循环说作为一种科学创新，经历了从“知识、说服、决策、实施、确认”的过程；其被广泛接受需要时间，是因其挑战既有权威、缺乏早期采纳者支持，扩散曲线呈现缓慢增长。二十年的斗争正体现了科学观念作为“创新”在社会系统中扩散时，受到认知阻力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影响。因此，对“逻各斯”的追求，成为支撑每一名科研工作者进步的能量。在新时代语境中，新文科研究不仅需要技术方法的更新，更呼唤一种以“逻各斯”为内核的精神气质——既不盲目追随时尚，也不困囿于传统，而是以深刻的洞察力、跨界的想象力和坚韧的探索力，在知识、价值与社会之间搭建意义的桥梁。这种方法论自觉，正是新文科在未来不断深化与拓展的基础。

作者在书中讨论科研的“困难”时，主张自然科学研究的独立性。自然科学是否具有完全的独立性，恐怕无一定论，但是人文社科的研究一定具有“政治属性”，这一政治属性也是对人民性的反映。新文科研究也应强调人民性，立足现实关怀，关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与个体经验，致力于回应人民的精神需求与人文诉求。

贝弗里奇强调了组织、交流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其既区分了自由型、服务型两类研究计划工作，也在“讨论”部分，经由续篇的“集体思维”强调了交流对学术创新的意义。在新文科研究环境下，组织与交流不仅是知识生产的支撑机制，更是激发跨学科协同与理论创新的关键力量。面对高度融合的学科格局与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新文科强调开放性的组织形式与平等性的学术交流，通过“集体思维”实现思想资源的共享与范式间的对话，从而打破传统学科的边界限制，推动知识体系的重构与公共价值的生成。关键不只是显性知识的积累，心理状态和思想习惯更是一种“隐性知识”。尤其在人文社科中，科研素养的进步绝不仅仅来自书本，而是在具体问题中进行体悟，由此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文科研究者。

六、余论——科研的人生

苏格拉底道，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想新文科不仅是一个研究问题，更是一个人生的问题。一个合格的研究者，一定是过着科研的人生。因此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知识”，而在于提示我们如何面对“科研的人生”。阎真的作品《活着之上》用小说的体裁讲述了科研生活的戏剧化图景。科研的生活绝不是一帆风顺的。科学研究的工作需要科研工作者保持学术的连贯性与专注度，未来社会图景赋予我们科研的责任感。正如每一位坚定选择科研工作这条道路的同行者，坚持与勇气是更朴素也是更加重要的科研素质。面对新文科建设，我们的倡议不应止于学科制度的重组或技术方法的革新，而应是一种深层的精神唤醒：倡导将科研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来对待，将研究当作生活的方式来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新文科的建设，需要一代代科研者将理想融入日常，将探索的激情维系在沉静的工作中，以“活着之上”的姿态，在知识与精神的双重磨砺中，塑造新时代的人文理想与公共关怀。新文科不是在信息洪流中随波逐流的学术修辞，而是面向未来、根植现实、承载信念的思想实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建构起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坐标，回应时代的挑战，抵达学术与人生的真实统一。在当下剧烈震荡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建设我们的人文精神家园。行文至此；歌未竟，东方白。

参考文献:

- [1] 皮尔斯, 查尔斯·桑德斯, 李斯卡, 詹姆斯·雅各布. 皮尔斯: 论符号 [M]. 赵星植,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 [2] Braun, V., & Clarke, V. Thematic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21.
- [3-15] 贝弗里奇. 科学研究的艺术 [M]. 陈捷,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9: 92 – 94, 97, 84, 57, 58, 65, 126, 31, 49, 133, 108, 61, 111.

Rethinking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New Liberal Arts: An Interpretation of W.I.B. Beveridge's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YIN Jian, ZHAO Jiam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W.I.B. Beveridge's classic work,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ground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ree core dimensions: "Scientificity, Criticality, and Logos."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e pathway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pursuit of the rational spiri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study emphasizes that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s not merely a handbook for research methods, but also a cultivation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a reflection on life philosophy. Furthermore, it suggests that researchers in the New Liberal Ar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structure of meaning between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care, achieving an integration of methodology and spiritual quality. This provides a critical and creative academic reference for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methodology.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Methodology; Beveridge; Thematic Analysis